

77/10

# 沈阳文史资料

第九辑

政协沈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1985·3

# 目 录

- 往事的回忆……………赵新华（ 1 ）
- 教育家车向忱兴办平民教育始末……………盛雪芬（ 18 ）
- 清末民初奉天（沈阳）教育界的几位名流……………王庆丰（ 36 ）
- 回忆先父陈国庆……………陈宜君（ 42 ）
- 东北军事教育机构沿革……………郑殿启（ 52 ）
- 我所知道的冯庸……………胡 震（ 73 ）
- 冯庸和冯庸大学……………冯介中（ 77 ）
- 伪满陆军军官学校纪实……………守 志（ 84 ）
- 两千五百里风雨山川
- ……………东北中学由湘迁川记 刘黑枷（ 97 ）
- 伪满建国大学……………刘世泽（ 118 ）
- 沈阳（奉天）男女青年会概略……………齐守成（ 133 ）
- 守田福松“三谏”郭松龄
- ……………（日）林正和著 张锦堂 任松译（ 151 ）
- 张兆麟与《醒时报》……………王毅夫（ 163 ）
- 一代名医马二琴……………彭静山 马显文（ 171 ）
- 沈阳清帮家理和清理……………潘居士 李格政（ 184 ）
- 太清宫纪实……………郁其文（ 196 ）

# 往事的回忆

赵新华



一九八三年五月，我接到了中央历史博物馆给我寄来的奖状和一封信。信中感谢我无偿地献出了张学良将军在西安事变后，送蒋介石回南京，临行前写给东北军军师长的手令复印件等文物，并告诉我此件已经开始展出。

这封信又勾起了我对往事的回忆和对张学良将军、周恩来总理等杰出人物的怀念。五十多年前的一段经历又在我的脑海里翻腾起来。

## 进张公馆始末

一九二八年，经我兄弟赵国栋介绍，我到东北军兵工厂庶

务处制服部当裁缝。不久，张学良将军到兵工厂视察，我见到了他。后来，一个偶然的机，才有幸结识了张学良将军。

当时，大帅府的一些副官，常去制服部做衣服。张学良将军有一个副官叫夏宝珠，他同兵工厂的稽查员张子明很好。张子明同我是磕头兄弟，通过张子明我认识了夏宝珠。

有一次，夏副官随张学良将军一起到兵工厂来，我正好遇上。张学良将军穿一身料子服，衣料很好，据说是日本首相权养毅送给他的。可上衣做的有点毛病，有一个袖头缝没对上，看上去有点往外扭。我就对夏宝珠说：“少帅的衣服有毛病啊。”夏宝珠说：“是啊，少帅早就看出来，可收拾不了，你能收拾吗？”我说：“你拿来吧，我试一试看。”过了几天，夏宝珠真的把衣服拿来了。我把袖子拆开，把长的那边去了点，短的那边用烙铁加热后，往外拽了拽，对上缝就又缝上了，不仔细看，瞅不出有什么毛病的。后来，听说他感到挺满意。那以后，夏副官又让我为少帅改过一条裤子。

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，兵工厂让日本人占了，我不愿意当亡国奴，就流落到天津。在天津东北同乡会，我见到了夏宝珠。他十分热情，问我以后打算怎么办。我说：“现在还没有着落呢，得请你多帮忙啊。”他说：“那你就给司令做衣服呗。”并相约等他的信。

那时，张学良将军的行营在北京，夏副官家也在北京。我等了一段时间没有信，就到北京去找他。他见到我叹口气说：“不是我不守信用，现在情况有变化了，少帅要出国，正在上海戒毒呢，给少帅做衣服的事就得以后再说了。”他想了想又说：“这样吧，我给于学忠写封信，让他帮你安排个地方。”于是，我就拿着夏副官的信去找于学忠。当时，于学忠是五十一军军长，河北省政府主席。他见到夏副官信以后，把我介绍到民政厅。民政厅长叫魏健，“九·一八”事变时，当过新民县长。听说我是新民人，对我挺热情，让我到河北易县去当公安

局长。他告诉我，易县县长也是你们新民人，到那方便。可是不愿意干，就说：“我还是干老本行吧。”他同意了。就这样，我来到五十一军辎重总队军工厂。其实，这个军工厂大部分是东北军兵工厂的老底子，熟人挺多，他们让我当了工长，负责裁剪衣服。

一九三四年，张学良将军结束了八个月的出国考查，回到武汉。一九三五年五月节前，于学忠被调到西安，辎重队也随他去了西安。这时，张学良将军在西安也有了公馆。

有一天，夏宝珠去军工厂做衣服，我们又见面了。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：“你可真有耐性啊，还做这个呢！”我说：“我愿意干这一行，就等你们回来。”夏宝珠说：“这回好了，少帅当司令了，你就到公馆去吧。”

第二天，张学良将军的副官刘海山派传达兵坐着小汽车到军工厂找我。到那就喊：“谁叫赵新华？”我赶忙说：“我是赵新华。”“那你上车吧，刘副官和夏主任请你去。”这时，夏宝珠已经当了呈启处主任。我一看小汽车，车号是七〇四，吓了一跳。我知道七〇四号车是张学良将军的夫人于凤志坐的专车，哪能让咱们这样身份的人坐呢？我赶忙说：“弄错了吧？”传达兵说：“你不是辽宁新民的吗？”我说：“是啊。”“那没错，就找你，上车吧。”我的心这才落了底。上车后，直奔张公馆。进了院，车头还没拐过来，夏主任和刘副官都迎了出来，唠起来，彼此是同乡，情投意合，我们三人到街上玩了个痛快。

后来，夏主任找到副官长谭海，说我是刘副官的表弟，过去曾给少帅改过衣服，少帅挺满意。谭海一听，同意我留在公馆内给少帅做衣服。但由于当时公馆内没有裁缝的编制，就把我安排到马匹管理所当个挂名上士，从此，我就进了张公馆，当了张学良将军的裁缝。

## 录 事 生 活

张学良将军在西安的公馆，原是西北军军长冯钦哉的住址。张学良到西北后，冯军长把公馆腾出来让给了他。公馆在西安市内的金家巷五号。

这个公馆大门朝北，四周有一人多高的青砖墙。进门后是一排瓦房，第一个屋是传达室，呈启处挨着传达室。呈启处同传达室中间隔一道门，门边还有一道岗。第二排是三栋楼，西楼上住着张学良将军和家眷，围绕这栋楼还有一个小院套。中楼住的是卫士和几个处的工作人员。东楼住秘书和外来的客人。西安事变前，东楼还住一位刘先生；西安事变后，听说他是共产党。三栋楼的后面，还有一栋房是伙房。

张学良将军公馆外边，有手枪营的士兵站岗，他们都是张学良的卫士。张学良将军有六十名卫士，八位副官。卫士都是尉官，副官都是校官，副官之上有一个少将衔的副官长，名字叫谭海，也是东北人。呈启处主任夏宝珠。一个呈启副官叫刘士斌。还有两个当差的。后来，他们就把我调到呈启处当二等录事。

呈启处的任务是负责登记、接待、安排晋见张学良将军的各界要人。一般的人和事，都由传达室办理和接待。举凡要见张学良将军的人，由传达室把名片送到呈启处，呈启处给登上记，写好姓名、职务、事项，然后报张学良将军批。有的批上午见，有的批明天见，也有的批不见的。张学良将军批回来以后，由呈启处通知安排。批准见张学良将军的人，不准带武器。经过门岗，由传达处过来，到呈启处。在通常的情况下，一般都要在呈启处稍候一会。东北军军官，到呈启处，都要把风衣、帽子等脱下来挂上，见张学良将军回来，经呈启处出去。大多数客人见张学良将军，是在张学良将军的会客室里。会客室就设在张学良将军住的那栋楼上。

我到呈启处是一九三六年的事。记得在十一月初的一天，副官处马副官把我找去，交待给我一个任务，调查西安城里和市郊各个部队的分布情况，包括中央军、西北军、东北军的留守处、办事处、仓库和部队番号、数量及其枪支弹药装备等情况。同时交给我一个登记簿子和一个副官处的证明信。在调查时，东北军当然没啥说道，西北军也没出啥差头，就是调查到中央军时，遇到点麻烦。那时，中央军住在西安的部队有三个，一个是胡宗南的第一师留守处；一个中央十二师；还有一个第一师。我调查那里时，他们不让调查，傲气十足，我拿出证明信，他们仍然不答应。我回去一说，副官长谭海又给我开了个特别证明，另外派了一台小汽车，让我坐着小汽车去调查。这回他们看我来头大了，才让了步。调查完以后，我把那个登记簿子交了上去，张学良将军挺满意。这个西安兵力分布情况的调查，我想对以后发生的西安事变是有直接用处的。

### 张学良将军生活点滴

我进张公馆以后，同张学良将军的接触逐渐多了。前后一共给他做过三套衣服，一套是灰礼服呢的中山服；一套是藏青色的料子服；一九三六年秋天，还做过一套灰布的象陕北红军穿的那样的衣服，听说是张学良将军上陕北同红军会谈时穿的。这种灰布衣服当时一共做了三十多套，要的挺急，三天做完。

张学良将军挺讲究衣着。给他做衣服，得试三次样子。先是裁好了，用线绷上，试一试，有毛病改一改；第二次，除了领子袖子不上，别的都做好，再试一下；第三次就是都做完了，再试一次。每次试衣服，都是副官事先通知我。

我给他做的衣服，张学良将军都挺满意。他认为最好的是那套藏青色的料子服。他曾在东北军军师长大会上讲，别人给我做这么多衣服，没有象赵新华给我做的这套这么合身的，特别是这个领子，穿着非常适之。从那以后，不少高级将领都来

找我，不过都不是由我做的，而是我领着他们到军工厂军服部去做，做时稍加指点。

张学良将军待人挺和气。每次去给他试衣服都是进屋后，他就站起来，用手示意让坐，并示意让副官沏茶。让他试衣服，也没有不耐烦的时候。后来熟悉了，我也就随便了。有时，他也同我说几句话。走时，他都站起来，很有礼貌。

张学良将军脾气也好，跟我没发过火，包括我后来当录事那段，他也没跟我发过脾气。听夏主任他们说，张学良将军对哪个人最不满意时，也不骂人，充其量只是拍桌子说：“你这个人真混。”不过，象这种情况也是不多见的。

我到张学良将军公馆以后，早晚都能见到他。吃饭，他和公馆的卫士、副官在一个食堂里。不过，他先吃，我们后吃。饭菜差别也不大，不同的就是他每天早晨喝一碗牛奶。那阵子，正是抗日战争时期，他在生活上是比较节俭的。自“九·一八”事变以后，他改抽中国烟，喝中国酒。抽“白金龙”烟，喝“西凤”、“汾酒”等。有人送他英国“白兰地”，他都不喝。

张学良将军非常喜爱体育活动，经常打“高尔夫”球，在卫士中专门有三个人培同他玩“高尔夫”球。有时也打排球、网球。他过去爱跳舞，但在西安的公馆内，没有跳过舞。那阵子于夫人和赵媵小姐都在西安，有时，他们也领着孩子散散步。

张学良将军很有毅力。过去他抽鸦片烟，“九·一八”事变以后，他就下决心戒了。听夏主任讲，张学良戒烟时，吃了不少苦。那时，他已经下野了，住在上海。开始戒烟受不了，得打针。后来决定要出国，他的针也不打了。针停了以后，折腾坏了。有时难受劲上来，在床上直打滚，于夫人和随从们看他折磨得那个样，都劝他再打针，他说什么也不肯。眼看再不打针性命都难保了，于夫人和大伙都给他跪下，劝他为国家、为民族着想，先打针维持一下，他说什么也不肯。他说：“我宁肯为戒毒而死，也不能为吸毒而生。”后来没有办法，请位意大



利医生想出一个办法，叫“营养灌肠”。就是把小鸡子和牛肉放在一起熬汤，然后用汤灌肠，一天灌两次。用这种办法，灌了十来天，过去那个难受劲了，勉强喝点粥，后来慢慢地好了。戒了毒，他出国到意大利。

我在张公馆呆的时间不长，可张学良将军给我的印象却是十分深刻的。

### 试骑“盖西北”

一九三六年秋，宁夏军阀马鸿逵送给张学良将军一匹好马。这匹马是菊花青色，四尺多高，五、六岁口。据张学良将军说，马鸿逵送马时，说这匹马很不得了，两头见日头，中午喂一次，一天能跑八百里。在西北五省独一无二，因此人称“盖西北”。

张学良将军得到这匹马以后，就想找人试一试究竟，于是就给各军下了通知，找能人试骑“盖西北”。可通知下去好一阵子，却没有回音，无人敢试，张学良为这事十分着急。

没人敢报名的原因主要有两条：一是对“盖西北”不了解，一听日行八百都发怵。第二条是对马鸿逵这个人不了解，都听说他很狡猾，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

一天，刘海山告诉我说：“张副司令找你。”我也就没加思索地去了。见到了张学良将军以后，他开门见山地说：“赵新华，你敢不敢骑‘盖西北’？”我一听这话，倒吸了一口凉气，心想，这样的马我可没骑过。可是今天少帅提出来了，我说不敢骑，不是伤了少帅的心吗？想到这，我就说：“敢是敢，就是没有太大的把握。”张学良听了很高兴，就说：“那好，那你就试试，骑不好也没关系，总不能老没人骑呀！”他看了看日历又说：“今天是星期五，你做好准备，下星期一试马。”并让副官通知东北军军师长和杨主任（杨虎城）、邵主席（省政府主席邵力子）参加。

事后我才知道，张学良让我试骑“盖西北”，是刘海山推荐的。

刘海山为啥推荐我呢？这里有这么一段过节：

我小时候就喜欢骑马，在彰武开军衣庄时，就跟骑马名手汪柏糊学过骑马术。汪柏糊告诉我说，马欺负人，你越发怵，它就越发凶，你放大胆子骑上去，把腿夹紧，它跑，你就让它使劲跑，它越快你越要加鞭，不管多烈性的马，也能训服。在他的启发下，我的马术也日渐提高。后来，治服了不少烈马，从来没摔下来。

一九三一年，我骑过一匹好马，这匹马是一个外号叫“老八点”的土匪头子骑的。它有两个特点，一个跳得高，跃得远，和马头一边高的墙能一跳而过，两丈多宽的沟能一跃而串过去；再一个通人性，在街上跑时，你用手一拍它的前夹绊，它马上放轻脚步，紧贴墙根走。因为这两个特点，“老八点”对它爱如掌上明珠。“九·一八”事变时，“老八点”被抓住了，入狱前托别人保护他这匹马，他说：“谁替我保养好这匹马，我出来时，除了我脑袋以外，别的要啥我给啥。”后来，他的朋友托我养这匹马，我从锦州一直骑到天津。“老八点”出来以后，送给我两只手枪和一匹黑马做为报答。这些事我都跟刘海山说过。另外，刘海山平时也看我在马匹管理所骑过马，他觉得我还有两下子，所以这才向张学良推荐我。

虽说我有这么一段经历，可究竟还是没骑过这么快的马。所以答应下来以后，我心里也还是七上八下的。公馆内的老乡听说后，也都说我太冒失。

试骑那天，我一早吃完饭，坐车来到了西安北门外的教场坝。这时候，教场坝已经装饰一新，临时搭起了布蓬，做看台。蓬内摆着桌椅茶点。过了一会，东北军的军师长们都赶到了，张学良将军、邵力子省长、杨虎城将军也先后到来。

张学良将军一到就问：“赵新华来了没有？”副官们都

说：“来了，来了。”这时“盖西北”已被马匹管理所的人牵来了，鞍子已经备好。我过去一试，觉得蹬皮有点短，就对少帅说了。张学良将军马上打发人坐他的汽车回去，把我常用的鞍子取来了。

一切都准备好以后，张学良将军就让我上马，我心里有点发怵，就说：“请长官们先上马吧，我后撵。”

“盖西北”一看别的马跑了，就有点急躁，前蹄直刨地，挺胸抬头，霍儿霍儿乱叫。马匹管理所的两个人紧忙活着，一个人为我拉马，一个人为我拽蹬。我一手抓住僵绳，一手抓住马鬃，左脚认上蹬，便飞身上马。谁知道这一瞬间，那马就蹿出去了，我一屁股坐到了鞍座后头。我一看不好，赶忙抓住鞍桥了，一挺身才骑到了鞍座上。随着，右脚也伸到了马蹬里。这时，心里才刚刚有了一点底。这马跑起来，两只前蹄都超过了耳朵梢，真象飞一样。耳边风呼呼直响，把我的帽子都刮掉了。只是一会的功夫，就把军师长们一个一个地甩到了后边。

可是，还有一道关没有过，就是下马。不少人出事就出在下马上，下不好，摘不开蹬，就有被托死的危险。为了能平安下马，我就设法让“盖西北”放慢脚步。开始是勒嚼子，不行，我又试着松嚼子，也不行。

又跑了一大阵，它不但不减速，而且连汗都没出。我心中暗暗称赞，果然是一匹好马。

我决心下马，于是把右脚从蹬里摘出来，刚想往下下，这马却突然放慢了脚步，我心中大喜，赶忙跳下马来，随着，这马也站住了。

下马后一打听，才知道这个镇子叫草滩镇，离西安城八十里地。

过了好长时间，那些军师长们和少帅他们才陆续赶到。大伙看我平安无事，都说我骑术好。张学良将军也称赞了几句。

## “西安事变”见闻

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一日晚，同往常一样，我闲着无事，就和公馆内的同事闲聊。忽然看见张学良将军的轿车开回来了，车到院内，张学良将军没有下车。小轿车在院内兜了一圈，又开到大门口才停下来。这时候，一位副官马上迎上去，张学良将军坐在车内问：“杨主任来了没有？”副官回答说：“没有。”张学良回头对司机说了声：“走！”小轿车便冲出大门，朝杨虎城将军公馆的方向疾驰而去。我们看了这个场面，都觉得有些异常。

过了不久，警卫张学良将军公馆的手枪营士兵紧急集合，全付武装，乘上汽车出发了。张学良公馆的警卫任务移交给卫队团一营。

一营一到张学良将军的公馆，就在四周的院墙上架上了高射机枪，贴院墙的里侧又搭上了跳板，人站在跳板上刚好能看到院墙外的情况。看得出，必要时他们是要以院墙做掩体固守张公馆。同时，在院子的外边也加派了巡逻哨，真是戒备森严。我们估摸着，晚上一定要有大的行动，但究竟要干什么我们说不清。这一晚上谁也没有睡觉。副官长谭海守在电话机旁，一步不离，十分严肃。

夜里，西安城里突然响起了激烈的枪声。接着，远处也传来了枪响。枪声越响越密，估计响了一个多钟头，才渐渐地稀下来。猛然间，副官长屋内的电话铃响了，这铃声好象比平时任何时候的声音都大。副官长一把抓起话筒，仔细的听着，我们也都在外边听着，只听他“嗯嗯”的回答着，没讲什么。突然，他一拍大腿，大声喊到：“什么？老头子跑了！这回可糟了。”他扔下电话，二话没说，起身坐车就走了。我们知道，他说的老头子指的是蒋介石。听了他的电话，我们才知道今晚上要抓蒋介石。不由得心里一阵高兴，因为那阵儿，东北

军对蒋介石都恨得牙根直。

第二天上午才知道，张学良和杨虎城在华清池把蒋介石抓住了。这时，我们心里的石头才落了底。这就是著名的西安事变之夜我在张公馆内看到的情况。

十二月十二日，我们东北军和西北军全部进入战备，气氛非常紧张。天上，飞机飞得很低，看样子随时都要轰炸。我们也架起了高射炮、高射机枪，注视着天空的动静。但不知为什么飞机却没有轰炸。

事变之后，在西安开了一个国民大会，我也参加了。会上，张学良将军慷慨陈词，讲得十分感人。他讲话的大意是：这次兵谏，我们是迫不得已的。弟兄们都知道，东北已经沦亡了，我们的父老兄弟姐妹们，正在遭受着日本侵略者的蹂躏，我张学良国恨家仇集于一身。自从旅欧回国以后我就发誓：尽毕生精力驱逐日寇，收复东北！可是蒋委员长却主张“攘外必先安内”，让我们去打红军。讲到这儿，他稍微停了停。接着，又十分肯定地说：“红军是没家的人，我们也是没家的人，没家人不能打没家人。要停止一切内战，谁要打内战，谁就是张学良的敌人；谁要打内战，谁就是东北军的敌人。”张学良将军的这一番话引起了到会者的共鸣，立刻响起了热烈的掌声。

随后，杨虎城也发表了讲话，他愤怒谴责蒋介石打内战的政策。并强调，这次兵谏，他与张副司令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。

在杨主任发言以后，还有一位刘先生也发表了讲话。据说他叫刘鼎。这位刘先生穿着青上衣，蓝色的毕几裤子，屁股上还补了一块青补丁。开始大伙不知道，后来听说他是共产党。他说：“同胞们，我们坚决支持张将军、杨将军的行动。他们发动的这次西安事变是为了使蒋介石掉转枪口，一致对外。我们早就主张建立爱国统一战线。大敌当前，中国人怎么能自相残杀呢？有志气有抱负的爱国军人应该去打日本侵略

者。我们不能看着大片的领土被侵略者任意宰割，全国各党派要立即联合起来，同心协力，驱逐日寇。”

到会的人，都感到他们的讲话很对。特别是我们东北军的将士们，更希望早日消灭日寇，重返家乡。当时在西安，一致对外反对内战的空气很浓。

### 三 见 周 总 理

西安事变前后，我正在张学良将军公馆呈启处供职。这期间，我有幸三次见到了周恩来总理。他那平易近人的作风，和蔼可亲的态度和那潇洒的风采都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，直至今日回想起来记忆犹新。

西安事变发生后，张学良将军的公馆已成了总指挥部，来这里见张学良将军的要人接连不断，我们呈启处也跟着忙了起来。

有一天（记不得是哪号了），一些高级将领刚刚离去，传达处又给我们送来一位陌生的客人。传达处的一位副官与呈启处的刘士彬副官小声说了几句，刘副官就去向张学良将军报告了。

这位客人头戴灰布帽，身穿一件半截夹大衣，个头不高不矮，体型匀称，步伐稳健，两道浓眉下的双目炯炯有神。一看就知道是一位与众不同的人物。他进屋以后，我马上迎了上去，他热情地和我握了握手，微笑着点点头。随后，顺手解开了大衣扣，露出了一身灰色的制服。一看这身服装便知道他是一位红军。他的衣着虽不豪华，但却十分整洁。我赶紧过去帮他脱大衣。他向我摆摆手，意思是不用我帮着脱。他自己把大衣脱下来顺手挂在衣帽挂上，接着随手把帽子摘下来，也挂到了上面，又用手轻轻地理一理头发，转身坐在沙发里。然后，微笑着问我：“张将军在家吗？”我说：“在，请吸烟。”我随手递给他一支香烟。他又摆了摆手说：“谢谢，我不吸烟”。这个人举止非凡，精明强干，可又不是盛气凌人，我仔细地打量着他。想问一问他是谁，但又不便开口。正在这时，

刘副官回来了，说：“张司令请周先生去。”听了这句话，我才恍然大悟！啊，原来他就是周先生。在我们东北军里早就听说有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周恩来先生，想不到今天在这里见到了。我望着他的背影，心中充满了敬意。

张学良将军这时已从客厅里走出来了。这一举动超出了惯例，一般客人来访，张学良将军是不出屋的。周先生这时也迎了上去，二人相见，十分亲切，好象故友重逢。他们一同进了会客室，谈了一会，就一起坐汽车走了。约莫有两个钟头左右，张学良将军、杨虎城将军同周先生又一齐回到了张公馆，谈了很长时间才离开。

过了一、二天，周先生又第二次来到张公馆。这次还是和第一次一样，到呈启处以后，自己脱掉大衣摘掉帽子，边脱边说：“还认识吗？”我赶忙起身，回答说：“认识，认识。周先生请坐。”当时，呈启处主任和副官都不在，只有我在屋。我马上到张学良将军的会客厅。当时，张学良将军正在屋里同客人谈话。我就回来对周先生说：“请周先生稍候，副司令屋里有客人。”周先生微笑着点点头，并打了一个手势说：“你也坐吧。”并亲切地问我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是什么地方人哪？”我说：“我叫赵新华，是辽宁人。”周先生说：“是沈阳市内的吗？”我说：“不是，我是新民县人，在沈阳西，离沈阳一百多里路。”“噢，你是什么时候到西安来的？从家出来有多久了？”周先生接着问。我说：“九·一八事变后，我就再没有回去”。周先生听到这，脸上的笑容渐渐地消失了，变得严肃起来。过了一会，又接着问我：“你家里都有什么人哪？”我说：“有父母、妻子和两个孩子，已好久没见面了。”说到这，我的心理不由得酸楚起来，想起衰老的爹娘，想起了年轻的妻子和幼小的孩子，眼泪在眼圈中直打转儿。

周先生似乎看透了我心中的痛苦，安慰我说：“别难过，这回好了，你与亲人不久就能团聚了，蒋先生已经答应抗日

了，你们可以打回老家去了。”

正在这时，张学良将军出来送客，又把周先生迎进了他的会客厅。

第三次见到周总理是在西安城里的长安县政府。当时，张学良将军已起程送蒋介石回南京了。

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早晨五点钟左右，我接到通知，让我去参加一个会议。参加这个会议的有东北军司令部各处和张学良将军公馆各处的代表，以及卫队的一些军官，共有三百多人。

在会上，周先生说：“革命的同志们，换一句话说，亲密的战友们，我马上就要起程回陕北啦。张将军送蒋先生回南京，同志们大多数还不知道，昨天走的，在洛阳住了一宿。蒋先生在洛阳黄浦分校发表了声明，看那个声明他是要撕毁自己的诺言。这样，张将军就可能要晚回来一个时期。”讲到这里，他环视了一下会场。接着，提高了声音继续说：“同志们，你们要记住，你们有个朋友，就是中国共产党。在张将军回来之前，你们有什么困难，就找中国共产党。”周先生的声音清脆洪亮，深深地打动着每个人的心。他的话音一落，立就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。

一九五〇年，全国解放了，我由西安返回老家，途经北京，在旅店呆了三天，等着换车。这期间，我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。大意是：我叫赵新华，在西安张公馆呈启处当过录事，曾经见过您。现在要回东北了，很想见见您，不知您是否有时间。信发出的第二天，周总理就派人来看我。来人说他在外交部工作，姓黄，让我管他叫黄干事。他说：“总理记得你这个人，让我给你代好，但他工作太忙，实在抽不出时间，请你原谅。”

黄干事还代表周总理在饭店请我吃饭，并说：“总理让我问你，是否能留在北京？”我说：“不必了，我离家乡很久了，



家中人口多，不方便。”黄干事说：“家属也可以安排在北京嘛。”我说：“请替我谢谢周总理，我久离故土，奔家心切。”黄干事说：“那也好，你回去以后，要安心工作，有困难可以来信。”我连声说：“谢谢，谢谢！”

回到家乡以后，没有什么太大的困难，所以我也没有再给周总理添麻烦。

### 我当了保管员

张学良将军送蒋介石飞往南京被扣以后，张公馆实际上就撤销了。张学良将军个人的财物都完好地保存着。他的财物开始由王博文保管，后来由我保管。

一九三九年春天，王博文要去河南卢氏县当县长，并约我去当民政科长。当时，东北军的处境已一天不如一天，所以好些人都自找门路，脱离部队。因此，能去卢氏县当一个民政科长，对我来说也算是难得的机会了。

可正在这时，于学忠的外甥魏成允干事找我，让我接替王博文的工作。当时，魏成允是少校干事，于学忠让他负责找人保管张学良将军和于学忠的个人财物，于是他才找我说这件事。是去当科长，还是保管张学良将军的财物呢？对我来说存在着选择的余地。那阵子当个民政科长是个美缺，保管财物责任大、担风险。但是后来我还是决定答应魏干事的要求。我想：少帅为国家为民族出了不少力，有功于国家，有功于人民；另外，他待我也很好。如今他含冤被扣，怎么能再让他的财物出差错呢！想到这，我便同魏干事说：“你放心吧，魏干事，这个差事我来干，有我在就有少帅的财物在，保证不出一差。”就这样，我从王博文手中接过了保管张学良将军财物的工作。

张学良将军的财物都装在箱子和柳条包里。其中樟木箱有